

警喻

薛建中 / 著

中国人

中国仍需思考！
不堪回首的往事、充满血色的历史；
中国战俘劳工幸存者张德馨悲惨的经历。
中国人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警喻中国人

薛建中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京)新登字 3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喻中国人/薛建中著.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5

ISBN 7-80112-113-9

I. 警…

II. 薛…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9349 号

责任编辑 刘云华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2 号 邮编:100006)

北京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3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30 千字 印数:0001-6,000 定价:19.80 元

目 录

警喻与思考 ——几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1)
思考之一:历史——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综合 基础是什么?	(3)
思考之二:现实——日本真的投降了吗?	(19)
思考之三:未来——中日关系向何处去?	(33)
序	(48)
引 子	(65)
第一章 事变冲击波	(69)
第二章 抗日前哨	(86)
第三章 邯郸地牢	(103)
第四章 东方奥斯维辛	(125)
第五章 “马鹿丸”号货轮	(149)
第六章 驶向北海道	(166)
第七章 门静之冬	(186)
第八章 死亡线上的抗争	(212)
第九章 雪城小樽	(229)
第十章 结识大西兰子	(250)
第十一章 战争尽头	(264)
第十二章 归心似箭	(279)
第十三章 有理有节	(300)

第十四章	札幌之旅	(326)
第十五章	千里急行军	(341)
第十六章	汽笛一声肠已断	(358)
第十七章	走进广岛、佐世堡	(377)
第十八章	归国途中	(394)
第十九章	解放区的天	(412)
后 记		(426)

警喻与思考——几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人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历程。1995年，世界上许多国家为此举行了规模不等的纪念活动，但那场由德、日、意法西斯制造并导演的人类悲剧在人们心头刻下的伤痕，却始终没有也无法被时间的巨手抚平。作为那场浩劫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中国人民对此更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50多年前，当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摆脱战争恶魔时，便早已为今天的纪念活动赋予了非同凡响的历史意义。然而，中国遭受的数千万生命牺牲，数千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心理创伤、文化毁坏和发展停滞，无疑又为我们今天的纪念活动增添了几分苦涩和沉重。当然，就像人们不能把孵出的小鸡重新变回蛋一样，不管历史对中国多么残酷，任何人已无法将之加以更改。也正因如此，历史便将怎样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的重任更多地交给了后人去承担。这就是我们今天不仅应该对50多年前那个世界性的特殊历史事件的最终结局进行庆祝和纪念，而且更应该对其发生原因进行反思的主要原因。而且从避免此类悲剧再次重演，对之进行反思并总结一些应该记取的教训，无疑会是更好、更有意义的纪念。因为在恶梦过去50多年之后，舍此就不能教育国民，警喻后人，推动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那么，日本以一弹丸小国，多次对中国这个泱泱大邦发动侵略战争，且最后一次侵略达8年之久，原因何在？秘密何在？日

本会不会再次成为军事大国？中日能不能实现持久和平？……如此等等，为善良不再被暴力蹂躏，为正义不再因受欺凌而哭泣，也为和平之光不再被强权扑灭，今天，很有必要对上述问题作一番理性思考。而为了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我们最好把历史作为思考的起点，然后再把它引到现在，推向未来。

思考之一：历史——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综合基础是什么？

战争是一对矛盾。和一切矛盾一样，它的发生、发展都是有条件的。同时，战争作为敌对双方互动式的矛盾运动，其条件又可以从矛盾双方加以认识。具体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因为它由日本的侵略引起，所以日本处于战争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战争得以发生起决定作用的内因；不分析这个内因，就不知道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对于中国来说，尽管因为战争是被日本强加的，因此处在战争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外因；但不分析这个外因，同样无法了解战争为什么能够发生。由日本在侵华战争所处地位决定，我们的分析首先必须从日本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开始。

一、关于日本方面

19世纪7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它还只是一个屈从于欧美列强、仰西洋人鼻息的弱小国家。但是，明治维新仅仅过了4年，日本仿佛被施用了什么法术似的，便把欧美列强强加于它的炮艇外交政策转用于其亚洲邻国，之后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使这70年基本上变成一部侵略、奴役他国的扩张史。那么，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日本侵略扩张的欲望之火在遇到强力阻隔之前能持续燃烧70余经久不熄呢？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因素无疑是应该格外重视的。

（一）携带强烈战争扩张基因的天皇制军事政治体制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天皇还只是全国最高的精神上统治的象征，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德川幕府将军手中。经过一场“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才确立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体。但是，和从前一样，这种新建立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仍然不能单靠观念上的权威来维持，无论这种权威是怎样被传统神圣化了的，它必须拥有足以制服反对者和维护并加强自己权威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就是警察、监狱，特别是军队。正因如此，当时还只是日本兵库县知事但后来四次出任日本首相、三次出任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就积极建议朝廷编一支常备军，“并尽量斟酌欧洲各国军制，以重新改革我国军制，由朝廷亲自统帅（中略），对内可以镇压暴乱，对外可以不屈于万国。”（日本《法规大全》兵制一，《春亩公文录》。引自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第137页）军队作为国家的核心部分，是保证国家机器安全运转的必要条件，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日本建立它的国家机器时在这方面有所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建军目的，除了它自身的安全考虑外，一开始就与领土扩张要求紧紧结合在一起。如长州藩士出身的重臣、被某些后人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就以改革内治的名义，积极主张建军与扩张同时进行。他建议：“遣使朝鲜，责其无礼，如不服时，则兴问罪之师，借以大振神州之威，如斯则天下陋习可立即一变。”（《木户孝允文书》第三。引自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第139页）尽管木户的这番雄心壮志决非当1868年内乱时连军费都筹不出来的新政府所能做到，然而天皇制刚成立不久便开始策划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一点对于认识天皇政权和它所要建立的军队的性质，却是绝对不应该被忽略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天皇制确实为帝国主义这个怪胎提供了足够的养分和最为适合发展成长的孕育环境。

为了把扩张的心理冲动变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行动，日本利用

1884年朝鲜的“甲申之变”，便开始按照“非常时”情况对军制进行改革，大力扩充军备。军制改革的核心人物是刚由德国归来担任陆军次官的桂太郎少将和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少将。他们根据对欧洲各国军制的考察，把建军目的分作两种，“其一，是只防御敌国入寇，并严守局外中立，欧洲二等国之建军目的是也。其二是大扬武威，当国家缓急之秋，诉诸武力以决雌雄……即所谓养他动之兵者，欧洲强国即一等国家之建军目的是也。”（《公爵桂太郎传》，参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第220页）他们认为日本军备也应和欧洲列强一样，以侵略性的（“他动的”）军队作为建军目标。于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特聘德国麦克尔少校为指导，以富有侵略性的普鲁士军制为模式，修改征兵法，建立师团军制，将之一步步变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御用工具。连桂太郎本人也承认：“不能不认为后来可以进行大陆作战的基础是在这时建立的。”

在剖析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军事体制原因时，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它的军事、政治决策机构。井上清认为，日本军制史上和全部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措施，“就是作为一个独立机关，脱离政府而直属于天皇之下，分别设立了参谋本部和监军本部。从此，统帅部和军令部便脱离一般政治而独立了。”（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1册第205页）而这一点才是天皇制军事政治体制的实质和核心。参谋本部设于1878年，它的前身参谋局只是陆军省的一个局，隶属于陆军大臣。而新设的参谋本部则直属于天皇，它不但不受太政大臣或其他任何人控制，而且参谋本部还可以把已经决定的军令事项下达它过去的上司“陆军卿责令执行”，这样一来，与其说从此“统帅部和军令部便脱离一般政治而存在了”，毋宁说它实际上造成了军部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局面，为军人更多地干预政治扫除了一道重要障碍。因为规定陆军大臣只限由武官担任，如果参谋本部通过陆军省向政府提出要

求，而政府不予采纳，军部便可以通过迫令陆军大臣辞职、不提出后任等，使内阁出现危机。这样做的结果，是军部不仅决定着陆军大臣的人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首相的人选和政府的政策走向。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典型事例，就是自明治维新后的 1885 年到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先后有 20 余人一次或数次出任过日本首相，其中包括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田中义一、东条英机这些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在内，出身职业军人仅有据可查者就有 14 名之多。其余某些非职业军人出身的首相如广田弘毅、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等，之所以能被军部所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热情丝毫不比那些职业军人出身的首相逊色。当一个并未受到外来威胁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是偶而是经常由职业军人来操纵时，这个国家所携带的战争基因和扩张意图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忧虑了。这种政治、军事决策体制起码大大简化了战争的发动程序，只要国家机器的中枢部位产生一丁点儿的战争冲动，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变成切切实实的战争行为。

（二）既是战争动因又是战争基础的日本经济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产物。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同时又是交战国双方人力、物力、财力的总较量。在这方面，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后所表现出来的三大特征就对其日后走上大规模的战争道路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特征之一：发展势头异常迅猛的资本主义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接触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时间起点并不比中国早，是资本主义国家列强中起步最晚的一个。明治维新前，当英国早已完成工业革命，工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之时，日本全国才仅有 400 多个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重工业。经过改革维新，在明治政府“文明开化”与“殖产兴业”两大富国强兵方针推动下，自 19 世纪 80 年代起工业生产就以持续的跃进速

度上升，此后只用了 30 多年时间，日本就变成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家族的重要成员。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统计，1899 年时，日本经济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1%，到 1937 年时，它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了 4%。而且这种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包含着相当多的科技含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上两艘最大的战舰都在日本，这就是主机为 15 万马力、排水量均为 6.4 万吨的大和舰和武藏舰。制造如此巨大的高性能战舰，至少要有 3000 多种工业配合。能够显示日本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还有它的飞机制造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曾使美国人非常头痛的高速灵活的菱式战斗机，日本人仅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就生产了 1 万余架。所有这些，为日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特征之二：资源贫乏，市场狭小，严重对外依赖的经济。日本经济这个先天性致命缺陷，过去长期被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表现并不突出。但当它的经济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并且在这条道上越跑越快时，资源缺乏的制约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了。现代工业是以加工、制造业的发展为基础开始起步的，这一切都要求有相应的工业原料作保证。而对已经走上快速发展轨道的日本工业来说，铁矿石、锰矿石、铜、铝、锌、镍、煤、原油等九项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中自给率最高者也不过 50%，其中原油、铁矿石、铝、镍等几乎全部依靠进口。这一切使日本现代工业的基础显得十分脆弱，发展的高速度也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资本要求自己不断增殖的天性，决定日本的经济列车一旦和资本主义并轨，要想不在高速前进的过程中半途抛锚，就必须为自己寻找可靠而稳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选择，但资本的本能性冲动就是走资本主义先驱已经走过的道路——建立殖民统治，而建立殖民统治却只有一条途径可供选择，这就是发动侵略战争。从这种意义上说，发动侵略战争又是其经济资本主义性质的一种内在要求。

特征之三：靠掠夺发展起来的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就是它的侵略扩张史。187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战争，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50万两白银的所谓“赔款”；1882年，日本出兵朝鲜，通过强迫与朝鲜政府签订《济物浦条约》，除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外，同时又勒索了50万日元“赔款”。如果说日本在这两次小规模战争中只能算是小有收获的话，那么，通过“甲午战争”，它则是大发横财了。这场侵华战争日本共从中国索得2.3亿两白银“赔款”，折合当时日币约3.5亿元，等于是它年财政收入的4.37倍。这是日本原始积累时期最大的一笔国外来源，对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着输血补髓的作用。正是利用这笔“赔款”，日本进一步扩充了军备，确立了金本位制，开始推行义务教育，并如日本历史学家依田憇家所说，“在日本产生了‘战争可以发财’的思想。”（依田憇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第21页）之后日本以占八国联军2/3的兵力积极参加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除得以与列强共享《辛丑条约》对中国的赔款勒索利益外，日本仅在天津一地就单独掠夺了200万两白银。随即爆发的日俄战争又使日本从帝俄手中夺得了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政治、经济权利。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日本称为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它通过军需品定货，商品、资本输出和对外的军事侵略，成了当时举世瞩目的“暴发户”，由原来3亿日元的债务国一跃成为拥有17.4亿日元的债权国。至于从对朝鲜和我国台湾长达数十年的殖民统治中及1931年后从我国大陆掠夺的财富，更是难以计数。

综上日本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三大特征，决定了它不仅具有侵略扩张的内在需求，而且具备侵略扩张的物质基础，更因侵略扩张与经济关系的因果关系而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刺激。

（三）扩张目标异常明确的对外战略

在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奉行一种从属于西方列强的战略，其设计者吉田松阴在 1855 年写道：“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引自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 2 册第 7 页）吉田设想尽管在当时未能立即实施，但其长期意义在于，它确定了日本殖民大国化的方向，即从海洋国家变为大陆国家。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随着富国强兵之路的一步成功，扩张欲望日趋强烈，把自己变成一个大陆国家的目标就越来越明确。1906 年，日军参谋本部作战科高级成员田中义一在《随感杂录》中主张，“脱离我从来之岛国环境，成为大陆国家”。而在此之前日本首相山县有朋于 1890 年提出“利益线”概念，则标志着史称“大陆政策”的北进战略的正式形成。“利益线”概念的提出，显示了日本走向殖民大国化的特有方式，即利益线位于国界线外，一俟变成国界线，便进一步向外扩展。

1894 年，日本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北进战略，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割断了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宗属关系，并割取了中国的台湾，实现了利益线和国界线的向外扩展。山县有朋在随后呈给天皇的一份上奏文中写道：“如欲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不可不谋求扩大利益线。”（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卷，有斐阁 1956 年版第 439 页）他还在 1906 年设计了一幅统治全中国、称霸远东的蓝图：“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之生产力富饶，足以使国家富强，而控制台湾海峡，则足以称雄远东。东以朝鲜为根据，西自中国南部开始，逐次谋求实利之进展，则可接近完成我之雄图矣。”（参见米庆余：《日本近代外交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1 页）同年，山县有朋在《帝国国防方针的私案》中提出：“将来扩张我国国利国权，以谋求面向中国为有利。”（参见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 3 册第 73 页）此后直到日本

1945年战败投降，这项以实现日本由海洋国家变为大陆国家的，对外战略始终是日本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

(四) 作为侵略扩张社会心理基础的武士道精神和盲目的民族优越感

侵略扩张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须要以一定的社会政治心理作为思想基础。这里，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武士是日本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是日本1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上最为活跃的一个阶层。这个社会阶层的特殊，就特殊在它不仅是职业的、世袭的，而且是社会的一个上层等级，是日本封建政权野蛮统治始终一贯的政治支柱。日本军事封建帝国的历史特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阶层的顽固存在和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也因而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武士文化的支持而变得格外危险。这种危险性主要来自“武士道”精神的如下特点：

其一：它本身内含的强烈侵略扩张要求。“武士道”精神的基本道德观念是“忠、义、勇”，其传统精神是崇尚武功，以杀伐征战为荣，其基本的政治信条认为日本乃“万邦之本”，其基本的政治理想是“征服世界”。这些思想观念尽管相当粗陋，但却是根深蒂固的。

其二：强烈的忠君、忠主观念。这种观念，同历代统治者对武士阶层的刻意培养、驯化息息相关。武士阶层连同“武士道”精神在内，归根到底只不过是统治者豢养的奴仆和精神统治的工具而已。只有在这个阶层中培育出浓厚而强烈的“忠君”、“忠主”思想，它才容易被愚弄、驾驭和利用，才能见容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换言之，“武士道”精神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依据，就是由这种观念决定的。这种观念就使“武士道”精神的信奉者成为一个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不是依靠理智而是凭借盲目顺从

决定行动的群体，即使抛开这个思想体系中固有的扩张意向不论，它也完全能够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社会心理基础。更重要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了军事改革，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日本政府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而军事教育的重要内容，就是向军队灌输“尊重天皇、忠于天皇、为天皇贡献一切”的封建道德观念，以武士道和为天皇效忠卖命作为军人的精神支柱。1878年8月，以陆军卿山县有朋的名义公布《军人训诫》，其要点为：军人对“圣上”，“即使有关御容等细节，亦不得发一言”，必须把天皇当成神崇拜；对于上级的无理横暴，必须绝对服从，绝对禁止关心政治等。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所有这些，更是大大强化了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统治者进行侵略扩张中的固有作用。

其三：广泛信奉的社会基础。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阶层在名义上被法律所废除，但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武士道”精神却没有也不可能随着一部法律的颁布而销声匿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武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被废除，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体系不再属于哪个特殊社会阶层，也因为过去的武士成为新政权的掌权者，它不但不会禁止反而会变相地加倍鼓吹、倡导这种精神，这些反而使它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如前面所指出的，在军队中尤其如此。如果考虑到日本自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起，之后经过不断修改，服兵役逐渐成为每个男性公民的一项不可逃避的义务，除有残疾者外，每个男性一生中都要应征入伍过几年军旅生活，在其中接受诸如《军人训诫》、《军人敕谕》那样的教育，就可以理解以“忠君”为内核的武士道精神的社会基础有多么广泛了。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采取自杀性攻击行动的

“神风”突击队员，日本战败后那些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和军人一起自杀“殉国”的无数平民，便是对这个观点的有力说明。

近代以来，“武士道”精神已有的扩张要求又因日本盲目优越民族心理的蔓延而加剧膨胀起来。这种盲目优越心理在“脱亚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此理论的始作俑者福泽谕吉（1835—1901年）曾大言不惭地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民精神”已从亚洲落后状态中脱颖而出，“移到西欧文明”，而亚洲其他国家仍处于落后状况地位，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不能坐等“邻国开明”，而应“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女学杂志》也沾沾自喜地赞扬日本：“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在“脱亚论”者看来，依日本之现状，侵略不但无罪，而且成为日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此，福泽谕吉的弟子、同倡“脱亚论”的尾崎行雄就肆无忌惮地宣称：“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之幸福也”；“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

二、关于中国方面

对蓄意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日本来说，具备了为此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心理及舆论准备，这是对战争行动起决定作用的内因。但它能否把侵略欲望转化成实际的侵略行动，又受到了侵略对象这个外部因素的制约。由日本侵华战争的性质所决定，战争贩子在发动战争前，必然要认真考虑以下因素：第一，战争期望效益。即战争投入和获利可能之间的综合指数比。如果引爆自己的一座弹药库只能猎获到对方一只母鸡，唯利是图的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这种蠢事。第二，战争保障条件。包括侵略对象的地理位置及由此派生的兵力运送、物资补给等多种因素。这就决定了日本的侵略欲望再强，也不会把那些地处遥远、鞭长莫及的国家选作首要侵略对象。第三，战